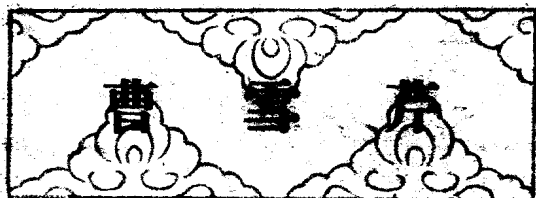


曹雪芹

周汝昌著



周汝昌著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我們有句老話：“讀其書，想見其為人^①。”這話也有時被誤解或借用為“讀其書，想知其人”的意思。不管怎樣吧，反正可見“書”“人”總是那等緊密相關。《紅樓夢》的讀者，大都因為想見其作者為人而更想知其人；而如果我們真能夠稍知其人——曹雪芹——的話，就一定會反過來有助於我們理解他的這部古典長篇小說名著。

《紅樓夢》，這“書”具在，流覽研讀，很是方便；而曹雪芹，這“人”，却還是一位我們努力想知而未能的人物，直到今天，我們所知于他的，仍舊是異常地有限。正因如此，想知之心就愈切，十個人有九個是提起曹雪芹來都談論興趣十分濃厚——其實就是求知願望十分迫切。這情

① 按此語來源當出《史記·孔子世家·贊》：“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又同書《屈原賈生列傳·贊》亦云：“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至《孟子·萬章》：“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乃為另一義。

形，我們大家恐怕都有“切身之感”。

本来，在我們悠久的文学历史上讲，曹雪芹不过是比較最为晚近的一位作家；可是在介紹他的时候，却远不能像介紹比他早了一两千年的許多作家那样地順利和翔实。这真是遺憾之至的事。——困难究竟何在呢？

~~这困难，是多方面的。~~

在客观上，截至目前所能发现并运用的为止，历史所遺留給我們的正面文献資料稀罕得不得了。从主观方面讲，研究者的努力也还不能說很够。研究过程中的空白点、模糊点、紛歧点又出奇地多。——这些空白点、模糊点、紛歧点往往就成为了解曹雪芹的关键性的阻闕。再說，这主题所牵涉到的方面及其种种复杂关系也又广泛又专门，通曉这么多方面和清楚这么些关系；对一个嘗試研究的人來說，真是难得很。最后，还有一点，也是十分要紧的一点，像曹雪芹，作为一个清朝乾隆时代的內务府滿洲旗下人、既有着特殊家世历史、又有着特殊本身經歷的“过来人”——这样一种类型的文学家、艺术家，他們的各种情况、各种特点、各种規律，究竟何似？这在我們的知識領域中，也还簡直可說是一穷二白，探討起来，了无凭藉，令人有茫然莫知所由之“苦”。

这样說，不是一味来強調困难，“徒喚奈何”。相反，正是要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尽可能地来試行了解曹雪芹。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要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

精神努力朝我們的研究目标前进。正是在这种的精神的鼓舞之下，才敢来尝试这个工作：对曹雪芹这样一位偉大的古典小說作家作一下介紹。

然而，客观困难还是存在的，各式各样的問題，在现阶段还不能立刻都获得解决。不向讀者說明是不对的。

不待說，空白点，我們不能凭空“制造”一些什么去填补它；紛歧点，我們不能主观武断，都作出結論；不太懂的事物，更不能强不知以为知。遇到这类困难，似乎只应采取以下的办法：空白的或模糊的，如果可能，不妨就某些迹象、綫索暂时加以較为合理的推論或假定；紛歧的，可以把問題本身加以簡要介紹而附帶提供个人的評議或看法；不太懂的，可以暫付闕如，或提出来以待专家解答。

由此可見，介紹曹雪芹时，除了那些較为确切的事实以外，目前还不能尽免于容許着若干的探索性的、假定性的部分。这些，自当随处即加說明，但也該先向讀者一总交代一下。

在此以外，还有一种困难，就是：要了解曹雪芹，如果只就他本人所生活的那区区四十年的过程来看，就会有許多事情不易明了，大部分的問題难于解說剖析。因此，先要了解他的家世历史，——而这和了解任何作家都必須知道一些他的家世情况的那个“一般命題”又并不完全相同。原因是，不仅曹雪芹的家世非常特殊，而且他本人

所經歷的种种变化，差不多都是一系列的历史政治事件所牽連产生的后果，种因甚远，牽緒頗繁，不由历史寻其来龙去脉，就无法說明曹雪芹那些遭遇的意义，也就无法窺見曹雪芹的思想根源和面貌。

但是，要交代这些，包括百十年間的許多事件（連帶制度）的发展演变，势必成为辞費，讀者就可能感到讲曹雪芹而讲家世和讲历史的部分太多了，不免有些“喧宾夺主”。——这是一个矛盾，很不容易恰当解决。

关于这点，我想只好这样：一方面，介紹家世和讲历史时尽量地簡要；另方面，也要求讀者諒解，我們并非是为了讲这些陈言往事而讲它們，是为了要說明曹雪芹的某一方面、某一問題而讲它們，目的只在便于更深入而全面地直接了解曹雪芹本人并間接有助于了解他的小說《紅樓夢》。在本书中，我并把一些在叙述上可以較为“独立”的章节特別分出去，降为“附录”，放在书的后面，这样，既便于尽早地直接介紹曹雪芹本人，也便于讀者补充理解那些前面叙說过于簡略的各种問題和关系，主次比較分明些。

其次，在行文时，有些地方感觉单用抽象概念的話来陈述那些距离我們很遙远的陌生事物，既觉空泛，又不易明白，因此有时引事例、借話头，从旁来比喻衬托，希望可以更好地說明問題，这也只是帮助讀者理解的一种手段，并不是“毛举細务”、故为枝蔓的意思。这点也希望讀者

諒解。

還有如何對待關於曹雪芹的傳說資料的問題。研究曹雪芹這樣的人，完全限於書面文獻，排斥故老傳聞，那可能是不正確的。但口傳各說法中也會因年久輾轉而走樣子或夾入附會。因此對這些，一面不抱成見，一面審慎考辨抉擇，適當地加以運用。或者只是出於存之姑備一說以待考察的用意而提到某些傳說，這樣的例子在本書中也偶爾有之。

最後，在介紹敘述中凡屬於常識性的歷史事實、習見習引的史料以及在考查研究上並沒有太大紛歧意見或疑問的，一般不一一列舉出處根據，以避繁碎。比較特殊的或有必要的，則加以小注，用備研核參考。順便在此說明一下。

好了，那就讓我們這樣來嘗試了解一下曹雪芹這位偉大的小說家吧。

二

曹雪芹是生活在哪些年月里的一位文学家呢？虽然大家对他的生卒年份都还有所爭論^①，但是可以粗略地说：他是生活于公元十八世紀的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这四十年左右的那一段历史時間。

从全世界看，曹雪芹的出生时期是在欧洲沙皇俄国等国家瓜分瑞典的“北方战争”（The Northern War）終了和俄国彼得大帝死亡之际；他的去世的年头就是与英、法的美、印殖民地战役紧密相关的“七年战争”（The Seven Years' War）終了、巴黎条约訂成之年^②。曹雪芹几岁的时候，牛頓（Newton）逝世；他死去的第二年，瓦特（Watt）发明了蒸汽机。曹雪芹二十多岁的时候，孟德斯鳩（Montesquieu）、狄德罗（Diderot）、伏尔泰（Voltaire）以及其他“百科全书派”的著作正在紛紛問世；他去世的

① 参看书末补注。

② 这是根据“癸未說”，即曹雪芹卒于一七六四年二月一日而讲的。
参看书末补注及第二十六节。

前一年，卢梭（Rousseau）出版了他的《社会契約論》（Le Contract Social）。曹雪芹死后十二年，美国独立战争起；他死后二十六年，法国大革命起。

在欧洲，这正是资产阶级革命前夕，各种反对封建、专制、教会等旧制度的新思想正在汹涌澎湃，历史上的伟大著作正在产生的“轉折”年代^①。

从封建中国看，那是滿洲貴族清代統治者从东北入关已然八十年到一百二十年的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延續到明季，腐朽已达极点，一場以李自成、張献忠等为領袖的农民革命已經要把明王朝推倒了，而当功亏一簣的阶段，明朝的汉族官僚地主阶级拉来了滿洲貴族地主阶级，联合鎮压了农民革命力量，篡夺了革命果实，使本来可能

① 这里只是把曹雪芹的生活時間放在“世界大事年表”上来看一下“位置”“座落”的意思，并没有暗示曹雪芹的思想是否曾受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启蒙”思潮的影响的含意。我們了解，在前此阶段，从明末到清初，天主教徒来华所輸入的“西学”，一点也不曾包括着十六、十七世紀欧洲的新科学、新思想，完全是代表封建教会的正統經院哲学；这因为那时的耶稣会本身就是捍卫旧势力、旧傳統的大本营，迫害“異端”改革的主凶，它不会也不可能把当时进步科学和自由思想傳入中国。至于当十八世紀初，即使有了海外商人到中国口岸来，是否就可能馬上及时地把当时的新思想傳播过来，而且发生了相当的影响，恐怕也是尙待研究的問題。探討曹雪芹的思想根源，首先还要从解剖清初时代封建中国的社会結構下手。但是，我們这里把目光放大些，先对照东西两方的情况看一看，也頗有意味。

早些发生急剧变化的那个古老社会又倒退了整整一两个世纪之久。約到康熙朝的下半期、十七世紀之末，經過长时期严重摧殘破坏的社会生产力，才逐渐恢复，封建經濟达到了一定的繁荣局面；同时商品經濟也在发展，商业与手工业之中心的城市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手工业尤其恢复、发展得很快，曾在明代滋萌的資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突破了限制打击工商业的清代封建經濟政策而得以重新生长起来；另一方面，农村生产条件却毫无改变而且恶化，貴族地主阶级为了滿足享受奢侈，掠夺剝削加重，商品高利貸資本又侵入了农村；因此农民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产和貧困。而曹雪芹降生之时，正当清代第三个皇帝（胤禛，俗称雍正）上来，那期間清朝軍事力量才剛达到极西南边，山东王美公、台灣朱一貴，都在“作乱”，青海的罗卜藏丹津在“反”，庄浪的謝尔苏部落“并不順归”；曹雪芹卒前一二年，清朝才在天山南路設立伊犁將軍。終曹雪芹之世，准噶尔蒙古，貴州苗疆，四川瞻对、杂谷，大金川，小金川，西藏珠尔默特，伊犁、叶尔羌回部……，“叛乱”无日无之，清代的民族压迫政策，使得阶级矛盾加上民族矛盾，因此这个帝国的“大一統事业”日在动荡之中，——乾隆皇帝的《御制十全（武功）記》，是直到曹雪芹卒后二十八年才作成的，可是这篇“大文”作出的第三年，就发生了貴州苗“乱”，第四年，自湖北开始、后来遍及数省的白蓮教也就正式起来了；接下去，“海盜”蔡牵，云南

保“乱”，川陕兵变，北方的八卦教（天理会），陕西的“箱贼”（木工），河南的“捻子匪”，云南的“夷乱”……，在一二十年間，相继起伏；而这时，“禁烟章程”已經提出——再往下看二十年，那就看見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篇的鴉片战争了。

曹雪芹就是生活在上述那样一个时代和时期里的一位文学家。

清代人常常自夸“乾隆盛世”，其实那不是什么“盛世”，而是看似极强而危机四伏的由盛至衰的轉捩点。再放大历史目光看一下，那其实也就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即将总崩溃的前夕，是新时代新社会天翻地复大变动的序幕的开始。这种时代的征兆气机，敏感的偉大文学巨人曹雪芹是感到了。这正有点像魯迅先生所說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領会之者，独宝玉而已。”^①

① 《中国小說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說》。

三

曹雪芹出生的次年^①，浙人汪景祺以所著《讀書堂西征隨筆》中詩文“譏訕聖祖仁皇帝（康熙），大逆不道”，立斬，妻子發往黑龍江為奴，期（ji）服親的兄弟侄兒等，俱發遣寧古塔（今黑龍江寧安縣屬），五服以內的族人，俱革職交地方監管。又次年，禮部侍郎查嗣庭，典試江西，出題有“維民所止”四字^②，竟被解釋是取“雍正”二字而“去其首”，又搜查出日記二本，多有直議時政之文，因此加上了“逆天負恩，譏刺咒詛，大干法紀”的罪名，革職拿問，瘐死獄中，還要戮尸示眾；兒子處死，家屬數放流。又隔了一二年，已故的陳人呂留良所評選、著作的詩文日記中被發現有“夷夏之防”“井田封建^③”等思想，并譏議時政，父子皆剖棺剝尸梟示，孫兒一輩發往寧古塔為奴，牽

① 這是按曹雪芹生于雍正二年（1724）的說法而講的。參看書末補注。

② 這是《詩經·商頌·玄鳥》里的成語。

③ 彼時用這個詞，意指周代分封諸侯的制度，即用以隱寓反對清代的專制統治的意思。

連者都获重罪。同时革职遣戍的工部主事陆生栴因著《通鉴论》论封建、论建储、论兵制、论隋炀帝而“罪大恶极，情无可道”，即在軍前正法；革职遣戍的御史謝济世因注釋《大学》有“拒諫飾非，必至拂人之性，驕泰甚矣”的話，指为“誹謗”，亦几乎被軍前正法（后赦回罰充苦差）。雍正并“御制”《大义觉迷录》，頒发全国，“教化”官民人等。

从这以后，終乾隆一朝，文字之禍，几乎不断，真是更僕难数，一字違碍，即兴大獄，挫戮慘酷，自古所未有。乾隆六年，下采訪遺书之令，这是后来計劃編集《四庫全书》——实际是要对所有书籍进行全面抽毀、篡改的文化阴谋——的濫觴。就是說，清朝不但用武力来鎮压反抗、統治全国，而且还想尽一切办法从“文治”方面来箝制思想、消弥人們的“反側”之心。

康熙留給雍正的国庫，据說存銀只有八百万两，經過雍正十余年的整頓，积至六千余万两，但軍費耗去大半；到乾隆即位，国庫还存二千四百万两。乾隆时候，国庫岁入三千余万两。而乾隆一朝所用軍費約在一亿二千万两以上。当时光是每年治河費一項，就要耗几百万两。但是这种有数字的开支还不能和沒数字的銷費相比：例如皇帝的六次南巡，各处的宮殿园林的修造鋪設。历史家說：“康、雍之世，庫儲常盈二千四百万两；乾隆中叶，增至七千万，末年乃无一存；盖皆为軍兴所耗矣。——此所耗

者府庫之財，尚未若民財之消耗也。南巡、營建二者，最耗民力。^①这是极正确的論断。其次，当时的官僚貪脏欺蔽的風气，已达到惊人的地步^②，乾隆所寵爱的权相和珅，到抄家时，其财产后人估計可达八万万两之多^③！至于民間“素封”地主，其豪富程度，也并不十分逊色，如清代皇族昭槤所記：“本朝輕薄徭稅，休養生息，百有余年，

① 語見邓之誠《中华二千年史》卷五中册 225 頁。关于南巡，参看书后附录。

② 可参看洪亮吉《更生齋文甲集》卷四《跋簡州知州毛大瀛所致书及紀事詩后》所記二事：一，“方御史錢澄之特糾国（按指国泰，山东巡撫）及山东亏缺庫項也，上心动，特命亲信大臣偕御史晨夕馳往勘实；其弟国霖覬知之，募善走者先半日馳抵济南。国仓皇丧魄，时署中积金实无数，因乘夜运入司庫及运司首府首县各庫，以补缺項。然存金尙累累，公廨后有珍珠泉，深丈許，遂舁至泉側沉之。后撫臣明兴浚池，尙得金数十万（两），盖国黷賄如此。”二，“項君，故浙江巡撫王寬望客也。方王遭母忧，拥妻妾，居会垣，并日事譚会，为人所发。王亦知罪且不測，而积重資至多，因闔門，召幕客散給之，数或三万、五万不等，屬曰：‘若无事，归我半。事不測，則諸君尽留之。’”則可見一斑。

③ “八万万两”的估計是否正确，无从詳核，但可以参看焦循《忆书》所記的一段話：“吳县石远梅，以販珠为业，一小匣，錦囊繡裹，以赤金作丸，破之，則大珠在焉；重者一粒价二十万，輕者或一万，至輕者亦八千，——爭买之，唯恐不得。余尝以問远梅，曰：‘所以獻和中堂（珅）也，中堂每日清晨以珠作食，故心徬灵明，过目即記，……珠之旧者与已穿孔者不中用，故海上之人，不憚風濤。今日之貨，无如此物之奇昂者也！’”当时官僚的驕奢貪鄙的駭人情况可以推見。

故海內殷富素封之家，比戶相望，實有勝于前代。京師如米賈(gǔ)祝氏，自明代起家，富逾王侯，其家屋宇至千余間，園亭瓊麗，人游十日未竟其居。……怀柔郝氏，膏腴萬頃，……純皇帝(乾隆)嘗駐蹕其家，進奉上方水陸珍錯至百余品，其他王公近侍以及輿僮奴隸皆供食饌：一日之餐，費至十余萬云！”①

所有這些統治、剝削階級的駭人聽聞的用度，都從哪裏來呢？就來自窮苦人民的身上。

那時候窮人生活的一般具體情況是甚麼光景，我們還找不到很好的紀錄。但是《紅樓夢》里劉姥姥的話就可供我們參考想像，她在看到賈府吃螃蟹時，曾算過一筆賬：“這樣螃蟹，今年就值五分(銀子)一斤；十斤五錢。五五二兩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兩銀子。阿彌陀佛！這一頓的錢，夠我們莊家人過一年的了！”②和《紅樓夢》約略同時的《儒林外史》寫南方窮念書人教館，每年束脩十二兩銀子，生活是敝衣、陋屋、白粥、小菜，——這還不就是最窮苦無告的勞動人民的生活，因為

① 見《嘯亭續錄》卷二“本朝富民之多”條。又言：“王氏……筑室萬間，招集優伶，耽于聲色；近日其家已中落，然聞其子弟云，器皿安置，猶足食五十載，——其他可知矣！”

② 這是文學作品，當然不能即作史料來拘看而計算其“賬目”；但如以乾隆時代一般糧價每石不過一兩五錢而計，四口之家如每月約需一石二斗、每年需十五石，則合銀二十二兩有餘。所寫并無誇張。

这还是基本上衣食俱足的饱暖生活。穷苦劳动人民的生活还要苦十倍。如《儒林外史》第三十六回，写农民是“替人家做着几块田，收些稻，都被田主斛的去了；父亲得病，死在家里，竟不能有钱买口棺木。”可为例证。从乾隆后期开始的人民反抗，正是他们实在活不下去的结果^①。乾隆初期，皇帝自己在“上谕”中供认，各地屡有“骄民”抗官，以为“皇朝”如此“仁深义至”，而民不感恩，为不可解。这真是封建统治者的“悲哀”。

曹雪芹死后十年，山东的以王伦为首的人民反抗就揭竿而起了。这是个大事件，它是人民革命大风暴的前奏曲，标志着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的开始动摇。——其实，这种朕兆，曹雪芹生前就已然出现了，《红楼梦》第一回就曾写到：“甄士隐”只得与妻子商议，且到田庄上去安身。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难以安身。^②”这正反映出了乾隆“盛世”

① 可参看满人舒坤批《随园诗话》语：“福康安则……心术较和珅为稍纯，而才具远逊；十八岁即为川督；天下总督除直隶、两江外，皆作偏。福康安为人，穷奢极欲，挥金如土，以冰糖和灰堆假山，以白蜡和灰塗院墙，以白綾緞裱糊墙壁。其出兵也，私带侍女，皆为男妆；每日所食，用银至二百（两），每站所赏轿夫银至二千！生民塗炭。七省教匪之乱，皆福康安酿成。”

② 本书凡引《红楼梦》，以经过后人改动较少的庚辰本为据，庶更合曹雪芹原意。

的一个要紧面。

曹雪芹就是生活在上述那样一个时期的那样一个世界里的文学家。

由于曹雪芹的特殊身份、特殊经历，他就有可能睁开了眼睛，看到了这个世界的一些问题。也由于他的特殊身份、特殊经历，他一不能注经（如谢济世），二不敢论史（如陆生楠），这才选取了为“士君子”所不齿的传奇小说这个体裁来抒写他的胸怀。又也由于他的特殊身份、特殊经历，他连吴敬梓那样专写“儒林”的略为广阔的社会面都不便写^①，这才又把主题完全集中于“记述闺友闺情”这一点上，丝毫不敢正面旁涉“大观园”外一步^②。——即使如此，那位“空空道人”也还是须要极慎极谨，“思忖半晌，将这《石头记》再细阅一遍，因见上面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誅邪之語，亦非伤时罵世之旨；乃至君仁臣

① 《雪桥诗话三集》卷十，“尝读何义门与人书，谓网斋选庚戌以后文，极佳事，但愚意渠所处与汉人不同，恐招惹是非，前有信止之，因近来时文内中（按指皇帝宫内）皆买入，前此刻诗文者皆受累，不无过虑云云。观此知吾乡（按实指辽东籍旗人）文字所以流傳独賤者，非无故矣。”即指出旗人“所处”之不同，此义可参。

② 《红楼梦》之不能相同于《儒林外史》，也在于：后者的主要目的是选择一种人物而对他們进行諷刺，而前者的主要目的却是选择一种人物而代他們进行控訴；因此，曹雪芹选定的就是受封建主义压迫殘害最深最烈的一种人物：生活在家庭范围的妇女。